

实践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 “对象性”活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实践观探析

丁立卿

(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省 吉林市 132013)

[摘要]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最初形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而言,他在文本中通过对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发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生命特质;同时,他以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观念发现了人的感性存在的生命特质。就马克思的哲学创新而言,他在文本中精辟地阐释了生产劳动是人的主体能动性与感性生命特质统一的“本性”生命活动,并依此进一步明确地阐释了实践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总体而言,马克思在文本中初步确立了实践观点的新哲学原则。

[关键词]对象化;对象性;感性;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5-0005-05

本文思考与研究的直接出发点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最初形成于哪个文本。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也是评价马克思早期经典文本的重要问题。当下,我国学界普遍认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形成的最初文本。但笔者认为,应把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的形成时间提前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依据是“新唯物主义”语境中实践观点的内涵已经蕴涵在《1844年手稿》文本内容的思想深层。在此,我们的研究意图是一方面能够发现《1844年手稿》在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形成中的文本地位与思想意义,另一方面能够通过《1844年手稿》的文本探析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的理解。

一、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抽象劳动”的批判

在《1844年手稿》之前,马克思意识到“人本身”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但“人本身”的奥秘是什么?立足于何种根基能够破解“人本身”的奥秘?凭借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已然认知了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决定意义,破解“人本身”的奥秘要深入研究市民社会。这直接促使了马克思将理论研究的视域扩展到剖析市民社会,《1844年手稿》就是这种转变的思想成果。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结合经济学研究展开哲学批判,意味着他确立了将形上哲学思考与人的生存方式融

[收稿日期]2014-12-22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及其对中国哲学时代创新意义的研究”(2014165)

[作者简介]丁立卿(1979-),男,吉林白山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合起来的新的研究方式。马克思透过经济学研究找到了哲学触碰与剖析市民社会的道路。正因如此,马克思在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批判中确立了破解“人本身”奥秘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根基。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人本身”奥秘的破解首先从批判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劳动”观念开始。他指出“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1]15},他们“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1]14},而“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101}。在此,马克思批判性地发现了国民经济学家和黑格尔站在同一思想立场上,将人的劳动分裂为抽象“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理论本质。

其一,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中抽象“物质劳动”的批判,先是肯定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贡献。亚当·斯密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与思想语境中阐释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性”特质,认为工人的劳动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在亚当·斯密之前,国民经济学家并未考察私有财产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只是将私有财产看作外在于人的客观物质财富,这种物质财富是推动工人进行劳动的源动力。亚当·斯密则将“人本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这是承认工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1]74},是国民经济学的历史进步。但马克思认为这种理论进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本质却是对人的彻底否定。亚当·斯密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的理论目的在于彻底发挥劳动是财富唯一本质的观点,把工人的劳动看成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把工人与自己劳动的本质对立起来。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被压迫、被剥削并过着“非人”生活,并非起源于外在私有财产的不公平,而是根源于工人本身所固有的劳动。工人的劳动决定了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处于被统治地位。这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一种抽象论证。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对人的劳动的物质性抽象理解,是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矛盾的反历史解释。

其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抽象“精神劳动”的批判,首先注意到了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劳动的分析与理解。但很可惜,黑格尔并没有真正揭示劳动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而只是片面抽象地强化了精神性劳动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性劳动是抽象自我意识具有的“本性”能动创造活动。自我意识依赖“本性”能动创造活动可以实现自我分裂,并在分裂的过程中建立起自我意识的对立面,同时可以通过否定对立面的方式返回自身。这种自我意识通过能动否定与扬弃对象的方式实现自身回归的矛盾过程,是黑格尔在他的头脑中进行的纯粹“思维运算”。说到底,自我意识分裂的对象是对象的自我意识,对象是自我意识能动生发的中间环节,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自我意识的认知和确证。黑格尔把自我意识与感性现实的人等同起来,所以他以唯心主义方式凸显了人的主体能动性。黑格尔凭借自我意识的抽象劳动构建了一个连黑格尔分子都“伤透了脑筋”的哲学体系,却被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清晰地破解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1]99}。他在头脑中进行脱离人的现实生存的“纯思”活动,但他的“纯思”活动却比以往任何一位哲学家都高明很多。黑格尔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为他庞大而神秘的哲学体系注入了丰富的感性经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现实的感性世界抽象为思维概念及其辩证逻辑之后,又在哲学体系中恢复现实的感性世界。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中,自然哲学是哲学思维抽象演化的中间环节。思维概念通过辩证逻辑外化出的自然界,不过是进行“纯思”活动的哲学家在头脑中想到了自然界。黑格尔不满足于纯粹的抽象思辨,意图以注入感性自然界内容的方式改变抽象思辨的不足,从而实现对自然界的否定性扬弃。但这种自然哲学中的自然界终究是披着“感性形式”外衣的思维概念及其辩证逻辑,而根本不是活生生的自然界。

基于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抽象劳动”的批判,我们认为,马克思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家和黑格尔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重视。当然,这种重视是脱离感性现实的抽象形式。国民经济学家用其来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价值,黑格尔用其来建构无所不包的哲学全书体系,但却成为马克思破解“人本身”奥秘的重要基础。

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观念的隐性批判

不同于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脱离感性现实的思想特点,感性观念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范畴。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1]96}。同时,马克思还赞成费尔巴哈在“实证主义”立场上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文本中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表明他没有真正跳出费尔巴哈的哲学语境。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马克思看到了费尔巴哈对国民经済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这的确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新的研究方式很相似,然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最终结论上的根本相异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方式其实是异质的。进言之,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隐性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感性观念。

在批判费尔巴哈感性观念之前,马克思在文本中总结了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功绩:其一,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哲学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思想产物,而根本不是人的本质;其二,费尔巴哈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人的现实本质;其三,费尔巴哈在实证的语境中将人自身视为获得现实本质的肯定性基础,摒弃了黑格尔哲学“否定之否定”的抽象基础。费尔巴哈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力图摧毁黑格尔从抽象能动的自我意识出发,经历间接性、直接性的否定之否定,最后又恢复抽象能动的自我意识的虚假实证科学。费尔巴哈希望从直接现实性建立起真正的实证科学,并使此种实证科学成为“具有感性确实性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可以说,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抽象性的深刻批判,才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贡献。在哲学从“纯思”的抽象走向现实感性的致思路向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有着共同的思想诉求。

但马克思并没有一味赞赏费尔巴哈,他批判性地指出了费尔巴哈的思想缺陷:其一,费尔巴哈以“哲学”(传统哲学)的方式批判黑格尔哲学,把自我意识的否定之否定看成黑格尔哲学同自身的矛盾;其二,费尔巴哈忽视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然界的感性经验,而只是注意到黑格尔以逻辑思维与辩证概念取代直观感性自然的思想特质。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注意到黑格尔哲学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将思维概念抽象统摄到哲学体系之中,他主张打破这种抽象哲学体系来返回现实,使思维概念获得直观感性存在的内容,成为感性的思维概念。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感性观念的缺陷暴露无遗。费尔巴哈没有为抽象思维概念转变为感性思维概念确立现实的中介,他不过是从黑格尔绝对抽象化的思维一极直接跳变为直观性的感性一极。至于抽象思维与直观感性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两极通过何种根基得以统一等关键问题,费尔巴哈还没有思考。马克思虽在文本中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提出的感性概念必须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他也已注意到费尔巴哈的感性观点实质上仍然是传统哲学语境的思想感性。施密特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感性观点上的差异。施密特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与自然都是一种前历史状态,或者说天然状态。感性的人“被动地、直观地同自然死一般的客体性相对立”^[2],而马克思的感性是具有“中介”的。

既然如此,摆在马克思面前的难题就是:如果不把破解“人本身”奥秘的重任放置在直观感性的根基上,那么,何种“中介”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真实统一?进言之,这种统一的本质就是人的感性与主体能动性如何统一的哲学命题。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済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发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特质,对费尔巴哈感性观念的批判发现了人的感性存在的特质,难道这两个发现是孤立的吗?显然,它们同时出现在《1844年手稿》中一定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共同服从于马克思破解“人本身”奥秘的历史重任。寻求真实的“中介”,将人的感性与主体能动性统一起来,既能够实现对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超越,又能够解决始于古希腊哲学的人与自然如何统一的哲学难题。

三、生产劳动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源性”感性生命活动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生产劳动为根基寻求人的感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57}。遵循马克思对国民经済学和黑格尔哲学“抽象劳动”的批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此表述的人的生产生活就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蕴涵物质性劳动与精神性劳动的双重劳动,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源性”的感性生命活动。

其一,人的生产劳动是有意识的感性生命活动。国民经済学家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把工人的生产劳动看作满足人与动物同质的纯粹自然性生存需要的手段,亦即工人的生产劳动是“赚钱的工具”。

人凭借“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生产劳动而存在,人之为人的特殊存在本性是无法外化表达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此种理解成为黑格尔论证客观绝对精神的现实依据。人无法通过赚钱劳动生成为人,就只能依赖抽象外在的精神性劳动来实现自身本性的生发。马克思认为,将人的生产劳动只看作满足人与动物类似的吃、住等生存需要的手段和工具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人的生产劳动被当作生存的手段与工具?马克思指出,这正是因为人的生产劳动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生产劳动不受人的肉体纯粹自然性生存需要的支配,人的生产劳动也就不与人的生命存在直接同一。进言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与意识去支配生产劳动。人既可能把生产劳动作为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类活动”,也可能把生产劳动视为人与动物同质的生命活动。这样一来,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对劳动抽象性、片面性的理解便不足为奇。

其二,人的生产劳动是自由的感性生命活动。正是因为人的生产劳动是有意识的,所以它才是自由的。马克思认为,动物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改造世界,但动物改造世界的生命活动是片面的、本能的,是被动物的自然规定性所决定的。但人的生产劳动是自由的,内含着人对美的一种本质追求。诚然,通过生产劳动首先要满足人的纯粹自然性的生存需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自由性否定了生产劳动的外在形式与人的自然性生存需要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人能够自由自主地与人之外的一切自然存在生成内在的生命关系。这种生命关系表征了人的生产劳动突破了动物生命活动的自然决定性,能够融合整个自然界。人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界为人所用,自然界也就成为人的“无机身体”。通过对人与动物生命生产自由性差别的认知,马克思意识到,人的需要显然不应具有“利己主义”的特质。由于人的需要不再是纯粹自然性的生存需要,人就应放弃仅仅按照种的尺度来改造自然界的价值目的,而应按照人之美的规律来构造人的活动对象。

其三,人的生产劳动使人拥有“受动性”与“能动性”的双重生命特质。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依据对人的生产劳动的觉解揭示了人拥有“受动性”与“能动性”的双重生命特质。一方面,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界,人和动物一样都需要实现生存。因此,人本身受到来自自然界的天然规制,生命具有“受动性”特质,人不可能彻底超越自然界。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又并非完全服从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制,人和动物的生存目的是不同的。因此,人能够凭借能动性、价值性的生产劳动实现对自然界的有限超越,通过生产与改造自然界,使人与自然界在生命融合中共同发展。马克思对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双重生命特质的揭示,表明人不是固定在那里的现成存在者,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否定性、开放性、动态性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矛盾的,其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区别又否定性统一的生命关系。人只有通过生产劳动将自身与自然之间这种矛盾关系呈现出来,人才可能实现对自身本质的觉解。黑格尔哲学中那个神秘的否定之否定的抽象辩证逻辑,在马克思这里成为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生命关系的内在逻辑。

四、实践是人的感性与主体能动性内在统一的“对象性”活动

生产劳动使人从自然界万事万物中超拔出来,成为自然界一类特殊的生命存在。在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传统哲学那里,人的感性自然性与主体能动性是分裂的。马克思以人的生产劳动为思想根基,将人的感性自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统一起来。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生产劳动观点没有从根本上冲破传统哲学的抽象语境,他的观点有着“多重不同质的含义”。我们认为,持这些观点的人忽视了马克思研究生产劳动的根本指向在于觉解人的实践活动的内涵,为破解“人本身”奥秘构建新哲学原则。生产劳动只是人得以区别于动物的基础性实践活动,还不足以担当一种新哲学理念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不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实践观点,而是在《1844年手稿》中已然阐释了实践观点的内涵。实践观点“秘密部分地隐藏在《手稿》之中”^[3]。如果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没有形成对实践观点的全新理解,那么如何解释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就依据实践观点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缺陷呢?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理论对立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才有可能,而旧哲学未能解决理论对立的原因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88}。在此,马克思已明

确将实践作为解决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理论对立的新哲学原则,并主张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考察冲破传统哲学的抽象语境。进言之,马克思正是运用对实践活动的全新理解,实现了哲学理念的根本转变,并在文本中初步破解了“人本身”的“理论之谜”与“历史之谜”。概括而言,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通过“对象性”与“对象化”两个哲学范畴深刻阐释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内涵。

其一,人是对象性的生命存在,进行着对象性的生命活动。在文本中马克思首先指出:人是“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1]107},这种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1]105}。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将生活世界的各种存在归结为抽象自我意识以精神活动方式创造的观点,并主张人通过自身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实现创造的观点。感性观点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哲学中继承而来的概念,意指人是感性的现实存在物,而这种存在物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言之,人的现实生存必然要以感性的、现实的对象为前提条件,这就像植物必须以太阳、土壤、水分为存在的对象一样。与其它存在物相比,人的生存需要的对象更多,人所拥有的对象也更丰富。单就对象性的存在特质而言,人和自然界其它存在物没有本质区别。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类似植物与太阳这种直接客观的感性、对象性不是人的感性、对象性。人需要通过对象性的生命活动确证自己的存在,亦即人是以独有的对象性活动创造自身的对象。显然,《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的感性观点与费尔巴哈是异质的。

其二,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实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生发人的丰富感觉。“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1]88}。在此,马克思透彻地阐释了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内在逻辑,亦即人能够通过对象性活动中的对象化实现人与对象之间的本质交换。由于动物的生命与其自身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因此动物与其生命对象之间进行一种本能的交换。动物能够进行何种物质与能量的本能交换,完全取决于它所属的种的生命本能特点。但人在对象性活动中能够将能动性本质对象化到活动对象之中,通过改变对象的属性来获得人性内涵的丰富。进言之,人的生命存在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人能够通过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不断发掘与积累活动对象的潜在本质,通过丰富对象的本质来实现自身本性的丰富。在文本中,马克思把人性的此种丰富具体化为人的感觉的丰富。人的感觉的丰富从主体性上确证了人的生命与自然界其它生命存在的根本区别。

其三,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是破解“人本身”奥秘的历史性范畴。以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交换为思想依据,马克思深刻阐发了实践活动的内涵。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通过它人能够实现本质“对象化”与对象“人性化”的内在统一。在自然界中,其它生命存在的活动方式与活动范围已被自然预先决定了,但葆有主体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的方式与范围却是不确定的。在人类生命生发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人的主体能动性发展程度的不同,人的实践活动也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质。应当说,在文本中揭示实践活动的一般性内涵还不能完全表明马克思冲破了传统哲学的话语方式。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存在的历史考量,则表明他已与传统哲学划清了界限。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人在非神圣形象(资本)中的自我异化,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历史悖论的实然性表现。人以实践活动生成历史性的主体异化,也必然通过实践活动走出历史性的主体异化,从而诉求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在此,我们并未只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现实的道德评判,而是在历史视阈中发现了马克思对人的实践活动本性内涵与实然性表现的形上阐释。实践作为一种崭新的哲学原则,在《1844年手稿》文本内容的深层已悄然形成。

[参 考 文 献]

- [1] [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2] [德]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14-15.
- [3] 吴晓明. 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微[J]. 复旦大学学报, 1996(4): 34.

(责任编辑: 余明全 曹妍)